

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方式的历史演进

梁建新 华红林

摘要: 坚持党要管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也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原因。在党百余年的奋斗史中,管党治党方式经历了以下几个演进阶段: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铁的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革命优良传统”+“政策法规”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制度”+“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依规治党”+“以德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结合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历史环境,探索管党治党方式的历史演进,有利于把握管党治党的基本规律,从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方式;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 K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11-0134-08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史,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中都高度重视管党治党,并将其作为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担负起伟大社会革命并领导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1]深入研究并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管党治党基本方式的历史演变,对于在新的赶考路上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铁的纪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靠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具有先进

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2],是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政党的独特密码,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铁的纪律”之所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缘由。

一方面,铁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和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时就十分重视纪律在管党治党中的重大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对盟员违反纪律的行为予以了严厉处罚,并对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纪律建设问题进行了规范。在1859年5月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3]这一论断充分彰显了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前提和保障。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将“无产阶级实现无条

收稿日期:2024-08-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与经验研究”(22ZDA075)。

作者简介:梁建新,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广西南宁 530000)。华红林,女,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特聘研究员(广西南宁 530000)。

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作为“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4],并高度重视执行纪律的彻底性和平等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延续和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的基因。因此,党自成立开始,就以铁的纪律作为管党治党主要方式也就顺理成章。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5]突出强调了铁的纪律是党的鲜明属性。

另一方面,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与此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前就开始探讨是否在中国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6]蔡和森从适应战争环境的角度突出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意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国内国外斗争形势都异常严峻,从国内来看,战争环境极其险恶,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党的安全,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从国际上看,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内忧外患中成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才能担负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并切实维护党的安全。党以“铁的纪律”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初步形成了党的纪律框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纪律的内容,并初步形成了党的纪律框架。中共一大党纲对党的纪律进行了初步规定,是党的纪律的雏形和萌芽,而后逐步形成了以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秘密工作纪律、群众纪律为主要内容的纪律框架。一是党的政治纪律。中共二大党章中首次对党的纪律予以专章规定和强调,共含九条,成为党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探索。随着全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党员人数的不断扩大,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制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首次提出政治纪律的重大概念,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7],科学标定了政治纪律在各项纪律中的特殊地位。二是党的组织纪律。从中共二大党章提出关于党员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到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再到中共六大党章对党员的入党资格、党的各级组织召开会议时间、党组织的民主选举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党的组

织纪律内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三是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为了保证党员和党组织的安全,党高度重视秘密工作纪律,“八七会议”对党在秘密环境下的工作纪律进行了严格规定,抗日战争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又使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得到了极大丰富。四是党的群众纪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对群众纪律提出了明确要求,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群众纪律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二,设立专门执纪机构。1927年下半年,面对极端复杂严峻的现实问题,中共五大党章专门设置《监察委员会》一章,对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及其与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及省委员会)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规定。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1928年中共六大以中央审查委员会取代监察委员会。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获得执政地位,重建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势在必行。1933年9月,中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组织暂行条例》,对省、县监察机构的任职资格、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从中央到省、县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也随之成立。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了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不断扩大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中共中央于1938年11月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在区党委之下设立监察委员会,并明确了监察委员会五个方面的职权。1945年6月,中共七大党章从制度上对党的监察机关的任务与职权作出了详细规定。

其三,运用铁的纪律对党员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为了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违纪行为的党员进行了严肃处理。比如,针对陈公博违背党的组织纪律的行为,中共中央将其开除出党;针对郭平伯、张子余、张绍康等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党的章程,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针对罗章龙等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等分裂党组织的活动,中共中央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并撤销其中央委员的职务,等等。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这对于维护党的安全、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顺利取得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最大限度保证了党在严峻革命战争环境的生存和发展,又为党步入长期稳定的制度治党轨道奠定了基础。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依靠铁的纪律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2]。

二、“革命优良传统”+“政策法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起新生的人民政权,并乘胜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由于受党内外复杂严峻局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方面一方面传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结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政策法规。因此,这一时期的管党治党方式,除了继续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之外,“革命优良传统”+“政策法规”也成为主要方式。

毛泽东于1937年6月在《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中指出,没有党的正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8],彰显了党的优良传统对于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取得革命胜利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优良传统之所以在管党治党中发挥重要作用,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党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从而应对国内外险风恶浪的考验。就国际形势而言,美国等西方国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开始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恫吓,美国挑起的朝鲜战争等也威胁着共和国的安全。就国内形势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生产水平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民党残余势力尚未完全清除,与当地恶霸势力相互勾结,与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相互对抗。因此,党必须发扬革命时期形成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谦虚谨慎等优良传统,冲破复杂严峻的局面。另一方面,克服党内出现的不良作风需要党继承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部分党员干部未能抵御住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骄傲自满、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不良风气蔓延生长,亟须党坚持并大力发扬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在管党治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结合管党治党新情况进一步突出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党的八大党章提出“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9]²⁴⁰。相较于中共七大党章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党的八大党章将原来的“党的组织机构”改为“党”,这一主体的变化突出强调了党及其活动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为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党的八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进行了修订,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9]²⁴⁰。相较于中共七大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党的八大党章将原来的“领导”改为“指导”,使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更具规范性、科学性。

其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等党的优良传统。1950年4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鼓励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对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正确地展开批评,并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对这些缺点和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此举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也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报告,强调此次大会应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10]。为此,党的八大党章对扩大和巩固党和人民的联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9]²³²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

其三,在决策上实行党委制。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就对党委制的含义进行了论述,提出通过建立党的委员会,由其对重要问题进行集体讨论,从而作出明确决定,并要求从中央局至各个党组等部门“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委制作为保证集体领导的重要制度被运用于国家生活中,同时在管党治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八大党章在七大党章基础上明确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规定“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9]²⁴⁰,同时充分发挥个人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内涵。

以“革命优良传统”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是对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优良传统的坚持和发扬,对于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集中力量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

改革开放后制度管党治党的出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还有一种管党治党方式,就是通过政策法规来治理和整顿党内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家建立之初,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订带有根本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12]。另一方面是革命战争时期政策法规思维的历史惯性使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决定、指示等政策法规管党治党并助力革命胜利。在“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的影响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管党治党的现实难题,依靠政策法规来解决党内治理与整顿问题,就成为了惯常手段。这一时期党依靠通知、决定、指示等政策法规管党治党,集中体现为:

其一,围绕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这一时期,党根据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法规政策。具体而言,一是针对干部队伍迅速壮大,组织结构增多的现象,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1953年),要求逐步建立党委各部分管干部制度。二是针对干部队伍迅速扩大且调动频繁,导致干部成分较过去更为复杂,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53年),对干部审查的意义、目的、范围及方法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三是针对革命时期迅速培养和提拔干部,导致出现党对部分干部未能及时进行审查和教育,干部经验积累困难的现象,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1957年),要求从过去迅速提升干部职务的方法转变为稳定干部职务、提高干部业务能力、提升干部思想的方法。

其二,围绕党员教育管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党员人数获得巨大发展,党员结构更为复杂,如何保证党员发展质量成为党亟须破解的课题。为此,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0年),明确今后发展党的重点是城市,首先是工人阶级,并部署了党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党内的情况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指出当前部分党员具有觉悟不高、思想落后、党员条件不达标等问题,强调必须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对党的组织进行普遍的整理。为了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1951年4月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对党的

基层组织整理和党员发展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

其三,高度重视政策法规的落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党就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便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违反党的政策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1955年3月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包括检查和处置党员有无违反党章、政策法规等行为。党的八大还将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写进了党章,进一步凸显了党对于政策法规执行的高度重视。

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政策法规管党治党,对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夺取社会革命胜利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处于百废待兴、内外交困之复杂严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颁布暂行条例、决定、指示等等来作为共同遵守的工作规范,是必要的,适当的”^[12]。同时,这一管党治党方式也为改革开放后管党治党走上制度化轨道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镜鉴。

三、“制度”+“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党的制度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并予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迈上了“制度”+“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轨道。

一方面,以制度管党治党是以往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基于对过去管党治党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决定走出一条依靠制度管党治党的崭新路子。另一方面,以制度管党治党是由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3]333}的观点。所谓制度具有根本性,是指制度是国家和社会运作的基石,决定了国家的政策发展方向和基本结构;制度具有全局性,则突出了制度对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全面影响;制度具有稳定性,则突出了制度的不易变动性,能为社会提供稳定的预期和安全的环境;制度具有长期性,则表明制度不仅关注当前党和国家发展需要,还考虑未来发展。正是因为制度具有以上特征,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才在不同场合均强调运用制度管党治

党。以制度管党治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发展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的基本制度。党颁布《关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若干具体问题的暂行规定》(1985年)、推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等,丰富和完善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将“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14]纳入十六大党章等,使集体领导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印发《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1990年)、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差额选举等,使党的选举制度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废除党内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交流制度、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1982年)、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干部人事制度;作出“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15]的重大部署,制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2009年),使巡视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等。

其二,发挥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法规制度的模范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16]¹²强调了党的干部在制度治党中的模范带头作用。1980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16]³⁷⁶。1993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要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带头同腐败现象作斗争”^[17]。

其三,实行巡视监督检查。为了塑造党内良好风气,强化制度的监督检查,从1993年起,党开始实行中央纪委、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从而形成监督合力。同时,党对巡视工作进行了初步探索。2004年印发了《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设立巡视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国陆续建立了专职巡视队伍,巡视工作在全国全面推开。《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2009年)的颁布,对巡视工作的机构设置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和部署。

这一时期以制度管党治党对于促进党内民主、确保政党治理的规范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保驾护航作用。虽然这一时期党已加快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步伐,制定了一大批基础骨干法规制度,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尚未形成,仍需继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打牢制度治党的基石,深化对制度治党的理论和实践认识。

这一时期除了突出制度治党的主旋律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注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如果

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就可能“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13]¹⁶²。江泽民旗帜鲜明地强调,革命和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需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今天党“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18],充分彰显了党的优良传统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之极端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依然需要以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来克服和杜绝不正之风的出现。以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管党治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断发扬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一是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使全党思想获得了极大解放。二是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三是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便是党充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佐证。四是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具有长期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越是向前推进,越要艰苦奋斗。1980年2月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出了明确规定。

其二,对全体党员进行新时期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过去管党治党经验,认为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同样丝毫不能忘记抓思想教育。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13]³⁶⁷此后,党通过颁布《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使全党始终保持心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从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其三,发挥高级干部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强大示范作用。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充分发挥高级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从而使管党治党彰显实效。1979年11月邓小平作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中,向

全党高级干部发出“模范地带头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13]²³⁰的强烈号召。在这一政治动员之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79年11月13日印发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从交通工具、家具和生活用具等各方面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进行了详细规定。1989年8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指出:“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廉洁奉公,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要带头。”^[19]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20]。

总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制度治党和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与工作惯例在管党治党中相得益彰,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强大保障,也为全面走向“依规治党”+“以德治党”的管党治党新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依规治党”+“以德治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深化了对制度治党的全新认识,突出强调“依规治党”,同时充分发挥“以德治党”在管党治党中的作用,使“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成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依规治党”置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21]的地位,并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一方面,依规治党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需要。进入新时代,面临以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首的六大难题,在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持续保持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尤为不易。另一方面,依规治党是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22]这一论述充分说明,随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党对自身的要求也应作出相应调整,必须提高依规治党水平,将依规治党作为党的永恒课题和长期战略引向深入。新时代依规治党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其一,积极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进入新时代,党持续推进建章立制,将建立健全党内法规

体系予以重点擘画。具体而言,党通过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2016年),构建了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体系;结合党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对党章进行修改完善;通过颁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2020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0年)、《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2019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23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2024年)等不断完善党的各项法规;先后三次(2013—2017年、2018—2022年、2023—2027年)制定出台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对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制定任务书、路线图;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清理机制,对不合时宜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专项清理,实现党内法规制度的“瘦身”“健身”,等等,使党内法规体系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

其二,发挥“关键少数”对依规治党的示范带动作用。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在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中具有统筹全局作用。一方面,党通过加强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教育的针对性,重点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教育、党内法规教育、国家法律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家风教育,使领导干部在学习教育中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事业观,从而发挥其带头遵守制度治党的模范作用。另一方面,发挥党的高级干部和“一把手”带头践行制度治党的标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高级干部和“一把手”带头执行党章党规、宪法法律以及民主集中制等各项制度规定,从而为全党制度执行之良好风气的塑造和形成做好表率作用。

其三,强化监督执纪和追责问责,使依规治党落到实处。一方面,加强巡视监督,形成监督合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立巡视巡察全覆盖制度;在深入开展常规巡视的基础上,开展更具机动性和灵活性的专项巡视、机动巡视、提级巡视,加强“回头看”;实行“三个不固定”“一次一授权”的模式;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做好巡视监督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巡视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等等,从而始终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另一方面,牵住责任制的“牛鼻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通过牢牢抓住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的“牛鼻子”,种好党委(党组)的责任田;压实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履行好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督办重大疑难问题;推动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严格担负“一岗双

责”,加强对党内不正之风的治理和整改;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2019年),建立健全问责机制,从而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提供了根本保障。

总之,依规治党对于新时代管党治党、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截至2022年6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718部”^[23],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24],为党统揽“四个伟大”、更好依规治党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撑。除“依规治党”之外,新时代的管党治党还突出强调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

其一,以德治党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25]科学标定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特殊地位。具体而言,依规治党作为一种他律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法规约束为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划定底线标准。但仅仅依靠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并不能达到良好的“善治”效果。故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离不开以德治党这一自律的方式,通过发挥“党德”的教化作用,才能使全面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

其二,以德治党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26]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了其必须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提高道德水平,提升道德境界,用较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守住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光辉历程创造的辉煌成就,并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其三,以德治党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的结果。经过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华民族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规范。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道德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理直气壮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27]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28]。因此,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传承和弘扬先人留给后代的思想道德资源,并利用这些宝贵资源中凝结的道德理念来管好党治好党就显得尤为必要。新时代“以德治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道德要求融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之中。党规令人禁恶,道德使人向善。进入新时代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有机统一,实现他律和自律相结合,使全面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为此,党中央分别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5年)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23年),两项法规相互配套、良性互动,既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又使党员干部对党内法规心存敬畏,开列“负面清单”,使党内治理达到完美的“善治”。此外,党把对党员的道德要求融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列,强调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等造成不良影响的,将给予相应处分。

二是加强对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29],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涵养洁身自爱、秉公用权的道德修为。为此,党中央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引导党的领导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帮助党员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做到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三是发挥党员领导干部为政以德、正心修身的模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以德治党必须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做起,“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上为全党树标杆、作表率”^[30]。为此,党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不断形成“头雁效应”。无论是中央八项规定对党员廉洁从政、勤俭节约的道德要求,还是《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要求党员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党都做到了从中央政治局开局破题。

回首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方式上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从建党初期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经过以“革命优良传统”+“政策法规”方式管党治党,以“制度”+“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管党治党,发展到新时代全面推进“依规治党”+“以德治党”。唯有把握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方式的历史演进,才能洞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在新时代新征程行稳致远、破浪前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J].求是,2023(12):4-7.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1.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
-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0.
- [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0.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08.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07.
- [9]《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7》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7[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9.
-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40.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01.
-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72.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8.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61.
- [1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9.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6.
- [2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2.
- [21]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N].人民日报,2016-12-26(1).
- [22]习近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J].求是,2024(6):4-7.
- [23]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充分发挥依规治党的政治保障作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纪实[N].人民日报,2022-06-26(1).
- [2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3.
- [25]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3(2).
- [2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8):4-20.
- [27]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学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N].人民日报,2017-10-16(7).
- [28]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求是,2019(12):4-12.
- [29]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7(1):3-10.
- [30]习近平.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强大力量[N].人民日报,2023-12-23(1).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Wa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Governing the Party

Liang Jianxin Hua Honglin

Abstract: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arty must exercise strict self-governance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trait and greatest strength of our Party. 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reason behind the Party's continual progression from one victory to another.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rty's century-long history of struggle, the methods of Party governance have evolved through several stages: First,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ron discipline" served as the primary approach to Party governance; second,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main method combined "revolutionary fine traditions" with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ird, in the new era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approach to governance focused on "institutions" along with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fourth,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ethods center on "rule-based governance" alongside "morality-based governance."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arty governance methods in relation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s and environments fac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crucial for grasp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Party governance and thereby advancing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way of governing the Party; historical evolution

责任编辑:何 参 长 亭